

萬耀煌主政湖北

——七省主席幕中記之七

·董中生

零點開始永難進步

民國三十五年夏，湖北省政府改組。王東原調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主席由萬耀煌繼任。

交接典禮在省府大禮堂舉行，省府全體職員參加，儀式甚為隆重。主席王東原介紹新任萬耀煌主席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軍事教育家，曾任陸軍大學教育長，成都中央軍校教育長。培育國軍優秀幹部人才，桃李滿天下。對保衛國家，厥功甚偉。

王主席提到有人誤認他們二人是保定同期同學。其實萬將軍是保定一期學長，他自己是後好幾期的小學弟呢。他對這位老學長的介紹詞，充分表示衷心敬佩之意。

交接典禮完畢，萬主席夫婦率領省府全體廳處局長，步行親送王主席夫婦至粵漢鐵路的武昌站上火車，赴長沙上任，禮節極其周到。

這是我入幕七省主席中，唯一參加主席交接典禮的一次。亦是我一生從政，參加所有機關首長交接典禮中，儀式最隆重，氣氛最融洽，主持

典禮長官態度最誠懇的一次。一般交接典禮，多半是敷衍例行公事，草草了事。等而下之，甚至前後任互相交惡的，亦不是沒有。

自從國民革命軍奠都南京到全面抗日戰爭開始，其間有十餘年時間，全國統一，正是我國政治建設的大好時機。錯過這個機會，乃由於共黨內戰，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最重要的，還是國民黨未能抓住機會，切實加緊進行建國工作。

那時我服務江、浙二省。政府亦曾發表了不少富有革命精神的青年出任縣長。許多新任縣長，到任之初，即大事批評前任縣長的缺點，然後提出他自己認為革命的新做法。可惜不出一年半載，他又被免職或他調了，繼任的縣長又是對前任大加批評，如此惡性循環，總是後任批評前任。

後來我改行教書。以為學校情形應該比較單純。其實不然。各系主任前後交接，和前面所講的縣長交接情形，竟亦大致相同。一種自己強過他人的心理通病，隨時可以見到。以為壓倒前任，就是提高自己的想法，在學校裏，仍是普遍現象。

我國過去數十年革命，破壞多，建設少。政府撤退至臺灣後，才開始有計劃地做一點建國工

作，效果就立即顯露出來，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相信不久政治、經濟等建設，有希望和歐、美、日本等國家，並駕齊驅的，所謂現代化，現在人家已登峯造極，我們不可仍留谷底。

新任官吏上任最重要的應該是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與理想，不應該大肆批評前任施政的缺失。這樣中國政治才不會永遠在零點上開始，無法進步。這次美國總統的提名選舉活動可供國人參考。

美國政治競爭勝負，取決於人民選舉。今年（一九八八）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是羣雄爭逐，共和黨是副總統布希與參議院共和黨領袖杜爾二人對抗局面。二黨內提名代表選舉，到本年三月底民主黨幾位候選人勝負尚未見分曉，得繼續競選下去，共和黨則副總統布希獲勝提名大局已定，杜爾決定退出競選。

共和黨第一個州愛俄華 IOWA 選舉代表時，杜爾獲票得首位，布希則名列第三。布希由於競選團組織嚴密，及以繼續推行雷根總統政策為號召，三月八日美國南部各州選舉代表時，即遙遙領先。杜爾雖欲繼續力拼，格於形勢祇得退出。

有人批評杜爾失敗原因之一，在於競選演講重在消極 (Negative) 批評布希，說布希是一位好副總統，不是一位好總統。缺乏領袖才能 (Leadership)。而美國選民需要的是競選人自己提出積極 (Positive) 政見，不是要你去批評他人。批評是選民自己和新聞媒介的事。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麻州州長杜凱吉斯於五月底亦已獲得該黨提名領先地位，將與共和黨布希，於本年十一月爭逐總統競選。由全國選民選出誰來任美國總統。

過江奔波另有樂趣

民國三十五年春夏之間，國民政府由重慶遷都南京人員，紛紛經過武漢。湖北省政府設在武昌，而商業中心却在漢口。過境人們爲了食宿遊玩方便，多住在漢口。省政府特在漢口設一接待所，以便就近照料過境的官員。

省政府尚有一個非正式規定：凡五院院長及黨元老過境，各廳處長應隨同主席同往迎接，在漢口接待所等候集合。

當時交通，無法準時到達，等上半天，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改期再來，空跑一趟的事，亦不止發生一次。

司法院長居正，湖北鄂東人，省政府爲對這位本省籍的革命元老，表示隆重敬意，正式通知全體廳處局長，上午九時在漢口接待所集合，準備一同前往迎接。那時省府廳處局長的交通工具是人力包車，由住家乘車至武昌渡船碼頭，等上長江渡船，乘至漢口碼頭，再乘人力車至招待所

，費時約需一小時半。因此，早晨七時即應從家中出發，以免遲到。

我們等到中午十二時，才接到居院長改日再來的通知，半日的時間浪費了，有人提議到一位住在漢口，剛從南京回來的省府委員家，探聽一些南京復員後的消息。

由那位省府委員告訴我，前湖北省財政廳長，時任國防部軍需署長趙志恭托他轉告我：陳辭公（誠）希望我去南京，將垂詢有關綏靖區的土地問題。

另一次被接的人沒有準時到，是新任省府秘書長鄧翔海先生，他從新疆省調回任鄂省府秘書長，鄧任吳縣（蘇州）縣長時，我任地政局長，是頂頭上司。我們等了半天，才知飛機誤期。這次等候，我認識了政校一期同學鄧繩武。當時他是萬主席的機要秘書。曾辦過報，當過縣長，國學根基相當深厚，我們一談，就很投機。

鄧是國大代表，來臺任憲政研討會副秘書長。武漢三鎮，政治中心在長江南岸，漢水之西的武昌，工業中心在長江南岸，漢水之東的漢陽、商業中心、遊樂中心，且是市民人數最多的，乃是位於長江北岸的漢口。

地政局籌備成立之初，全省地政工作尚未展開，工作並不十分忙碌。抗戰八年前線縣長的緊張生活，正好趁此工作稍閒，生活略爲放鬆一下。周末過江到漢口吃吃小館子，看場電影。乘長江渡輪，多半是風平浪靜，船行駛不快，費時約二十幾分鐘，才能渡到對岸。我常以乘遊船的心

情，過江不以爲苦。反而覺得是一種樂趣，一種享受。

在漢口海關碼頭登岸，步行十幾分鐘，有一條小巷，朝南的牆壁上掛滿出售的字畫。日本人承受我國文化，對國人字畫特別嗜好喜愛。漢奸們投其所好，常搜集字畫贈送，以聯絡增進感情。日本無條件投降，這批字畫就被拿出來廉價出售了。

我每次經過那條小巷，喜歡站立那裏欣賞一小時。許多字畫，當然是膺品居多，或是後人臨摹的。但有些贗品，作者功力並不遜於真品，臨摹的幾可亂真。尤其裱裝精美，不失其藝術價值。

我在蘇州服務時，曾收集一部分當地名畫家的字畫，那時在蘇州徵求字畫，祇要買張宣紙，寫上敬賜墨寶或畫寶等字樣，寄給一般書畫家，大概多能在相當時間內，寄回你一張字畫。蘇州的文人書畫家，不以賣字畫爲生。用現代術語說，他們多半是業餘的，他們爲名不爲利。

張一塵、李根源等老先生，未等我開口，就送我字聯了，那是對後輩的勉勵！

仰觀星斗飄飄欲仙

漢口地勢較低，每年夏秋之交，長江水漲。沿江街道，恒有被水流之慮。武昌、漢陽因有蛇、龜二山，地勢較高，名勝古蹟亦較多。

蛇山公園的黃鶴樓，位於長江南岸。樓雖不高，建築亦算不得雄偉，可是樓建在蛇山頭頂，面臨長江。遠望浩翰江水日夜不斷向東流，那種

氣派，那樣動力，給遊客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南京、武漢、重慶是沿江夏季最熱的三大都市。民國二十六年夏，我由南京初抵武昌。路過安慶時，買了一張竹片編織的扇子備用。每夜睡醒，席上總是淌着一大堆汗水。感覺到武昌的酷熱更超過南京。

我住家離黃鶴樓不遠，步行二十幾分鐘可達。炎夏夜晚，我喜歡上黃鶴樓小丘頂上，泡一壺茶（茶資便宜，公教人員尚能負擔），叫一碟瓜子，臥在躺椅上，仰觀星斗，江風習習，頗有飄飄欲仙之感。

蛇山公園的抱冰堂，是湖北人特為紀念張之洞的地方。湖北人對張文襄公愛念特深。張之洞督鄂二十年，興教育，辦工業，維護地方安寧，培育各方面人才，使清末民初湖北省佔全國很重要地位。因此湖北省人特建堂紀念他。

蛇山中段開了一個山洞，使山前山後來往方便。我曾在山後洞口住了一段時間。租的是我小同鄉武漢大學物理學博士葛正權教授的房子。他選在洞口建住宅，利用物理原理，洞內空氣流動方向，配合房屋結構，夏天盛暑住他的房子，比較他處的房屋，要涼爽很多。那時武漢的房子，全沒有空調調節設備，甚至電扇亦不多見，夏季能有較涼爽的房子可住，是很幸運的了。

成績低錯不在孩子

杭州的西湖，嘉興的南湖，是我在浙江服務期間，有機會多次遊玩。武昌郊外的東湖，我在湖北工作二次，每次亦均前往一遊，第一次是民

國二十六年夏，由省地政局長汪浩約我去，他開局裏的汽車接我到東湖游泳。汪局長善游泳，而我乃在初學階段。由於湖上設備簡陋，尚無救生設備，我祇敢在湖邊淺水處活動，不能隨汪往深水遠游。盛暑能在水中泡幾小時，亦是很舒適的活動。

民國三十五年暮春三月，我帶妻和三個小孩，又去遊一次東湖。我和妻步行，三小孩合乘一輛人力車隨行（當時省府廳處局長，政府供人力車一輛，每月車伕工資由機關支付。）前次乘汽車去，感覺路並不太遠，好像很快就到了。此次步行，走了三個小時才到，來回走路就費了六小時左右。

幸好是春天郊遊，我和內人脚力尚健，欣賞沿途鄉村風光，興趣不減。但一位朋友的太太，隨我們同去，平時沒有走長路的習慣，可就苦了她了！

東湖旁的洛珈山，是我國著名大學之一，國立武漢大學校址所在。該校由王世杰等歷任校長慘澹經營，在洛珈山上建立規模宏偉校舍，聘請平、津等地著名教授來校任教。最能打動各地教授前來執教的是國立大學教員薪水，係教育部規定，大致各校相同。而武漢大學能供給名教授在洛珈山上一幢新房子居住。那裏湖光山色，風景宜人，是學人們最喜歡居住之地。

除了武漢大學外，湖北省的高等教育，省府在恩施時，設有省立師範學院。復員後，又在武昌郊區設立省立農學院。該院聘我兼授土地經濟學一課，每週二小時。我乘人力車去上課，交通

倒沒有什麼困難，只是顧及局內工作，無暇編寫講義。

我選定美國威斯康辛 Wisconsin 大學創辦土地經濟系主任伊黎和魏爾萬教授合著的「土地經濟學 Land Economics」為課本。好在當時商務印書館正將該書翻譯，分上下二冊出版，書店可以購買。該書取材，當然完全採用美國資料說明，同學沒有讀原文的習慣，看譯本又提不起興趣。

學期考試，我正將調任湖南，就將試卷請一位國立商學院土地經濟系畢業的局內同事代為閱卷評分。他對學生的分數打的特別低。我事後知道，深深覺得對同學不起，因為上課時，同學都很用心聽課。考試成績低，老師要負的責任，應該比同學還多。

來臺後，我在中興大學任教及兼法商學院教務主任時，總是鼓勵同學和同事：希望將來學生學術成就要比現在的老師好。老師們不可以打低分數，使同學失去他們自己的信心。

民國三十二年我離開浙江，調往湖北。三個孩子年幼，均尚未上學。民國三十五年他們由老家來武昌，女兒插班三年級，長子進一年級，次子進幼稚園。

女兒年齡稍大，學校功課尚能勉強跟上。次子讀幼稚園，沒有什麼功課壓力，並無困難。祇是長子換了一個新環境，兩地老師的口音又有差別，他聽不懂老師講的話，讀書興趣就減退了。當我第一次接到學校成績單，看到他的成績不及格，一氣之下，重重責打他一下，使我終生懊

悔，從此以後再不責打孩子了。但已於事無補！學期結束，通知他留級。此時我已完全明白，這不是孩子的錯乃是做父親的只知為公家做事，全不注意自己孩子學業的緣故。亦是使我來臺後多留心兒女學業的原因。

那時我又將從湖北調往湖南，如果孩子跟我一同走，又要換一個新環境，豈不又增加一層困難？與內人商量結果，決定將較大的女兒及長子送回老家就學，避免屢次更換學校，誰知此一安排，以後大陸撤退，造成我夫婦僅帶次子來臺，大的二個孩子留在老家受苦受難的慘劇。

共黨生產隊派我女兒上山砍柴，她空手而回，自然受到嚴厲處分。文革期間她逃往安徽、江西，最後因領不到口糧，還是回到老家，一個十四歲沒有父母照顧的孩子，以後雖亦生了兒女，可是她自己却早夭折了！長子還算幸運。他考進師範學校，擔任小學教員，雖然文革期間，曾喝了三年每天三餐稀粥，尚能健在。現在美國的弟妹們，有機會匯點錢給他，補助家用。對他的子女幫助來美求學。算是對哥哥一點補償，使我夫婦心中稍覺安慰。

研討推行土地政策

湖北省政府遷回武昌後，即設立設計委員會。會內並成立土地小組。聘曾任國立商學院土地經濟系主任為召集人。地政局成立後，這位召集人堅決推薦我兼任。他的理由是設委會乃是一個空機構，沒有人來辦行政工作。地政局不僅有地政人才，且局內職員可以調來辦小組的一般行政

業務。我認為他的理由正當，就義不容辭接受了。就在我全家遊東湖的那天，星期日，邀請小組全體研究人員來我家晚餐，隨即舉行研討會，那時年輕，雖然遊玩一天，走了近六小時的路，回家尚無疲累感覺。晚上開會，仍是精神抖擻。那晚討論的主體是：如何推行三民主義的土地政策。

由於參加研討會有幾位是以專家身份參加，他們不是政府官員，因此發言較為自由。抗戰期間，共黨向國際宣傳，他們是以土地改革者自居；而國民黨政府，抗戰勝利後，雖行政院地政署後來擴大為地政部，各省亦成立不少地政局。但縣以下，實際從未推行過真正的土地改革。

抗戰勝利後不久，行政院亦會通令全國豁免田賦，實行二五減租。這一命令各省接到後，自然照轉各縣，各縣亦隨即轉令各鄉鎮。大部份轉到鄉鎮為止。亦有少數再轉發到保甲的。保甲長拿到這件公文，他們能辦什麼呢？去問地主，叫他們減租。地主回答：「租早已減了，佃農欠的租，現在尚未繳清呢！」

因為我國各省地租，過去幾乎都是「口頭租約」。政府實在無從查起！何況認真去推行減租的保甲長，又能有幾人？所以豁免田賦是真正做到的；至於減租，完全是一紙空文，佃農絲毫得不到實惠。

國民黨中央，似乎亦沒有堅定推行土地政策的決心。地政機關規定的主要工作和抗戰前一樣，仍是整理地籍、測量、登記等工作，測量、登記是平時做的事，費錢又費時。而此時國共戰爭

日益激烈，政府已集中全力與共軍作戰，整個政府財政優先用在軍事支出上。

記得一次南京召開的全國省主席會議，江蘇全省行政督察專員奉命列席。行政院長張羣主持會議。湖北省主席萬耀煌即起立大聲疾呼，要求政府以全部財力，先打敗共黨，然後再談其他。各省主席一致附議。

對日抗戰勝利，國民政府聲望雖極隆。可是在大陸，幾乎完全未曾推動過實施土地政策。中央雖曾設立過地政部，各省亦曾設立不少地政局，但我們規定做的工作，仍是測量、登記。測量、登記又因限於財力，無法展開。實際地政工作，全在停頓狀態。

反而共黨利用土地改革，作國際宣傳，分田運動，吸收農民，增加兵源。雖明知其欺騙農民，仍是一種極大的破壞政府的革命力量！國民黨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等到大陸失敗，撤退臺灣後，才覺悟到與共黨鬥爭，真正的土地改革，才是可以幫助獲勝的重要條件之一。

推行土地改革阻力之大，亦是一般人未曾想像到的。越南前總統吳廷琰，伊朗前國王巴勒維，皆曾親自來臺灣考察過土地改革，亦都承認臺灣的土地改革完全成功，可供他們自己國家參考。但均因國內反對力量太大，而遭失敗。伊朗的宗教團體，越南的地主階級力量，扼殺了土地改革。

現菲律賓總統艾奎諾 Coragon Aquino 夫人，號召人民力量 People Power 競選當選，亦曾答應推行土地改革。可是一九八七年一月馬尼

拉農民請願遊行，要求實行土地改革時，反而槍殺請願民眾十五人，槍傷數十人。我曾於該年一月二十七日爲此事去函艾奎諾總統，表示關切。並建議如實行改革時有什麼困難，我們可以提供臺灣實際經驗，供她參考。迄今尚未見菲律賓開始改革，可能由於艾奎諾總統及其親屬自己就是大地主。她雖亦曾表示：如果土地改革法案國會通過，她必遵守法案首先實行。但要知道，多數議員是地主的國會，要求它通過土地改革法案，是多麼不容易啊！

臺灣的減租，是在那特殊時機情況下，首先實行而後才擬訂減租條例的。耕者有其田條例，是由當時行政院長陳誠，以去留力爭，才順利通過的。那時反對土地改革的人，亦能認識當時臺灣政局，如果陳誠解職，可能對大局不利。

公共預算人事之爭

省政府設在恩施時期，省議會議長石瑛老先生多病，那時省議會的主要任務，在發動民眾，領導民衆協助政府進行對日抗戰。抗戰勝利，省議會選回武昌，議長由何成濬將軍繼任。此時的省議會，正在學習民主政治的起步階段，主要對省政府，在政治上爲制衡作用。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湖北省議會，召開選回武昌後第一次會議，省政府各廳處局長列席作施政報告。地政局成立才幾個月，說不上有什麼工作可報告的。只將地政局的組織、人事，及今後工作方針，作了一個大概的說明。由恩施過來的議員，知道陳辭公在鄂西設有一個地政實驗縣。

戰後新選的議員，多半本身就是地主，他們是反對推行三民主義土地政策的。因而和地政局採對立態度。一位鄂南某小縣選出的議員，提出質詢，其中有一個問題，我是無法答復的。他問：「你憑什麼資格，來湖北任地政局長？」

當時會議主席何成濬議長，可能亦認爲這一問題有些離譜了。他就立刻宣佈對地政局質詢已結束，通知我可以離席了。

萬耀煌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人事更動不多。除新任秘書長和人事處長外，祇更換了民政廳長一人，新任民政廳長王開化，鄂北人，留學德國。回國後，曾在西北軍馮玉祥部下做過事，擔任捐稅一類業務工作。他在武昌市內，一個滿池栽種荷花的小湖旁，建有二幢小洋房。一幢出租，一幢自住。他沒有其餘廳處長回到武昌即需找房子住的麻煩。

王開化廳長個性剛直，辦事極小心謹慎。我任國防部民事局副局長時，他任局長。其時局內尚有一個上校專員的空缺，他答應一位曾任他部屬的湖北同鄉簽派擔任。後又顧慮怕人說他任用私人，不敢簽報辭公。由我簽會任浙江省吳興縣長的東北人王非同學充任。

湖北省政府會議，每星期召開一次。星期三上午舉行，會後中午即在會場用餐。有一次王開化廳長與漢口市市長徐會之（曾來臺，因涉及附共嫌疑處決）爲了討論漢口市公車預算問題，大起衝突。徐市長提出的預算，每輛公車，除司機外，另列一名售票員，一名查票員。王廳長認爲過分浪費。徐是黃埔一期出身，軍人脾氣發作了。

他說：「漢口市不辦公車，我仍可能做我的市長，預算不通過亦沒有關係。」完全是意氣的話。王廳長還是堅持一車祇能有一位售票員，不能列查票員的主張。

調湘遷臺二次相見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湖南省政府主席王東原來電邀我去長沙任湖南省地政局長。萬主席表示挽留。尤其秘書長鄧翔海，是我蘇州任職時的頂頭上司，更堅決留我。最後還是經陳果夫先生向兩省主席商量後，才答應我調任湖南。我於七月初離開武昌到湖南。撤退來臺終於民國四十年六月，又在臺北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再見到萬耀煌教育長。

民國四十年初夏，同住在臺北士林的洪儀同學，他是蔣經國任贛州專員時的幹部，來臺後任安全局機要秘書。特來我家談起他將被調上山到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他從保管的受訓學員成績記錄中，得知我在中訓團及實踐院的受訓成績分數都很高，希望指示他一點受訓經驗。

學員受訓成績記錄，據說保管是很機密的，外面人不容易知道。聽說老總統蔣介石，很重視此項受訓成績記錄。一次總統府機要室主任陳宗熙和我幾位同學閒談時，對他受訓一期同學評分普遍特別低，表示很憤慨，恐將影響他們一期同學個別政治的前途。其實據我所知，成績好的，未必能得到多少好處。而成績差的，也許有可能受到相當損害。此即同學們受訓後，常自己警惕的所謂：「前程有限，後患無窮」也。

洪同學既然慎重其事地請教我，就不能不供他一點兒經驗。我告訴他：「受訓時間僅一個月，你上山後，暫時將其他公私的事，全部放置一旁，專心接受訓練，精神集中，最為重要！」

「訓練機關，總是注意考核的，但受訓人數那麼多，要表現個人長處的機會却有限。你祇能在規定範圍內，儘可能表示你自己的優點。例如報到表要仔細留意填寫，其中自傳一欄，雖規定限寫五百字，仍可將你一生重要事業成功失敗寫進去，供輔導人員參考。」

「表示文字能力的地方，在寫聽講筆記，同時可以看出你的學識見解。表現口才語言能力的，在小組討論，此種場合，不講話當然不行，過份喜歡講話，亦容易引起人們反感！」

「最重要一點，受訓生活與平時工作時不同，難得有機會改變你一段時間的生活環境你可以當它是一種享受。講課的有好材料，或新東西，當然接受。即使講的全是陳舊的，一無可取的，你亦不妨將它欣賞一下。至於考核、成績等事，最好不要放在心上，你這一次上山，一定會很愉快地下山。」以上的經驗之談，不知洪同學是否同意接受？

革命實踐研究院設置輔導人員，負責輔導受訓學員生活，及考核受訓學員成績之責。院內編制僅有少數專任人員，大部份輔導員係在已受訓學員中，成績優良者，選若干人留院，或向各機關借調已受訓學員回院服務。我在行政院工作時，曾被調回院任黨政班第十三、十四兩期輔導員。並規定任輔導員二期以上，有資格被調任輔導

委員。我又被調任第二十三、二十四兩期輔導委員。輔導員大部份指派擔任受訓學員的生活輔導，及考核工作。有時亦指定若干人參加研究院內教材等問題。我在十三、十四兩期回院服務時，奉派參與「光復大陸土地政策」的擬訂，未參加生活輔導及考核工作。

當時正值金門砲戰前夕，海峽兩岸對峙形勢，極度緊張！大陸天天高喊「解放臺灣」，臺灣亦在準備隨時「反攻大陸」。革命實踐研究院必須準備一套一旦軍事登陸，能立刻宣佈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新政策。

光復大陸土地政策，原則上以臺灣成功的土地改革為藍本。但我國疆土甚大，各地區自然環境與社會條件相差過鉅，政策僅提供原則性的規定。各地區按其實際環境，准其各自訂定實施辦法。唯對農田政策，則堅持耕者有其田原則。

考核之害兩個實例

我任第二十三、二十四期輔導委員時，才開始參與受訓學員考核工作。由於院內專任輔導委員鄔繩武同學，是湖北省政府的老同事，那時他任萬主席的機要秘書。以後萬在報章雜誌發表的文章，多半經過鄔整理的，鄔是湖南人，與萬夫人有同鄉之誼，他們好像還有點親戚關係。

民國五十九年夏，我老三由美回臺舉行結婚典禮。由鄔同學陪我邀萬先生夫婦與余井塘老師，來臺北自由之家證婚。二位老先生那時的年齡，都可以杖於朝了。（禮記：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我國古禮尊老，人到了八十，可以持杖

見天子，不要下跪了。）我後來帶小兒及媳婦至新店萬公館致謝，萬先生對二個青年在美求學，能專程回國舉行婚禮，還特面予嘉許呢。

承鄔學長將考核學員成績的辦法，詳細向我說明：每位輔導員大致負責考核十名左右的受訓學員。一位輔導員負責四位輔導員所管受訓學員的考核。通常一期受訓學員一百餘人，得設三、四位輔導委員。

考核大體上分兩部份，一部份是學員受訓成績的考核。由輔導員根據學員自填的自傳，聽講筆記，小組發言等評定每人分數。另一部份是學員個性品格的評定，由輔導員觀察每一學員的言行，對他作一個概括的總考評。評語院方印有許多四字一句的考評，由優到劣，供輔導員選用。擇其合適的辭句填在每位學員的考評欄內。

每期受訓學員畢業前，由輔導委員召集四位輔導員開會討論。習慣上多半按照輔導員的意見通過。輔導委員先提出本期受訓學員最高與最低成績大概標準。例如我參加受訓的第六期，輔導委員提出的最高成績標準比較高，而陳宗熙同學受訓的那一期，輔導委員提出的成績標準就比較低。這種考評，據說蔣介石總統是很重視的，至於是否公正，有無意義？我在聯戰班受訓時，曾和班主任張岳公（羣）討論過。我說：短短一個月的訓練（黨政班一個月，聯戰班三個月），讓輔導員觀察學員的個性品格，考核其成績，實在有困難。以我自己經驗，輔導員們觀察所得，對學員的品格個性，尚有幾分近似，至於成績評定，正確性實在不敢自信。但岳公不同意我的意

見。他說：成績考核是有事實根據，表示他是否努力接受訓練，至於個性品格考評，全是抽象語句，沒有多大意義。

上述討論及岳公約聯戰班每位同學個別談話時，看到我歷次受訓成績分數很高，他說：「你過去受訓成績很好。」所引起的。

革命實踐研究院，除調受訓學員回院任輔導員及輔導委員外，尚有調回擔任研究委員的。民國四十六年，爲了整理辭公的「臺灣土地改革」一書，院方特指撥單獨宿舍一幢，以研究員名義，要求我在山上住院三個月，將該書整理完畢，定稿後才下山。

一位在民政廳工作，調院服務的同事私下告訴我：我在第六期黨政班受訓成績特別高。並說：爲了登錄我過高的成績分數，曾任青年軍師長調院任輔導委員的潘師長，還和代理教育長王東原有過不同意見，王認爲我的分數過高了，應酌予減低。潘則認爲既由輔導員據實考核，不可任意更改。如果上級沒有充分理由，隨便更改，豈不表示對調回院服務的輔導員工作不信任？

其實我自己心裏明白，我的分數是過高了。因爲後來我亦曾擔任過輔導委員，那種考核是無法保證十分正確的。所以我會向張岳公面陳不要太注重學員們的考核分數。對學員們考核分數高，未必對他未來的政治前途有多少幫助。但如果對他考核分數低，那倒很有可能影響他的前途。我任輔導委員時，臺灣省警務處長陶一珊亦被調受訓。他在上海到臺灣都被認爲是軍警界的紅人。有人稱他爲戴笠部下十三太保之一。原本政

治前途似錦，但參加了那一期受訓，却大大影響他以後的政治命運。

那一期由陳誠副總統兼任班主任，在紀念週上辭公當衆宣佈：在國家財政如此困難，對美援要特別有效運用的時候，陶竟向美援運用會提出要求，撥款給警務處建造一所有空氣調節設備的新式大禮堂，（那時辦公廳裝冷氣，視爲奢侈）實在太不瞭解國家處境的困難了。這一公開宣佈，對陶的考核自然不利，他的政治前途，可能會受到相當影響。另一位黨政班第六期受訓的同學杜師長。結業後到處找同學拉關係，有一天到鳳山向我借錢。我回答：我這個縣長不管縣政府的錢，自己薪水僅夠維持家用，歛難幫忙！最後他要求借車送他到新營，可能會向臺南縣長薛人仰借錢。

婚姻問題宜早解決

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成績優良同學，被選高級班受訓，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一階段受訓一個月成績優良同學，被選入第二階段聯戰班受訓三個月。聯戰班受訓，上課時間減少，增加研究、討論。我是民國四十二年參加聯戰班第一期受訓的。那時海峽兩岸正在高叫「解放臺灣」和「反攻大陸」口號，我們這一期主要課程就是研討光復大陸的各種方案。

我參加財經組土地小組。同組有監察委員郝遇林（黃豆案被判刑去職）中信局經理趙聚鈺（後任退除役官兵輔導會主任委員）等共五人。各組擬訂的方案，經反覆討論，於結業前全

部定案。其中有二個問題，爭辯最烈，未能獲得一致結論。一爲房屋應否歸還原業主，另一爲如何解決有關婚姻問題。關於農地應歸現耕農民所有，不退還原地主，意見大體上一致。至於房屋應否歸還原業主？討論時正反雙方均堅持意見，不能相讓。據說大陸共黨現在亦有意退還部份房屋給海外僑民，可見住的問題是一個很現實而又不容易解決的問題。至於婚姻，抗戰八年，就造成了不少抗戰夫人，抗戰丈夫。這次，國民黨政府遷臺，造成海峽兩地夫婦分離時間更久，再婚的人數更多，家庭關係更複雜。要想出一個合情合理的解決方法，實在不容易。聯戰班結業前，舉行一次大規模的作戰演習，萬教育長曾任陸軍大學教育長，對軍事演習特別重視，他認定演習就是真正作戰。這次演習，先將上述擬訂各種方案分發同學，作爲處理問題依據，隨時發出情況問題，要求每位同學做出他自己認爲最好的處理辦法。院長蔣公介石在演習最後一天，親臨檢閱。那天在大禮堂參加演習的每位同學，皆特別賣力，希望給院長一個好印象。但演習後有人向張岳公探問：「院長對此次演習印象如何？」岳公回答：「院長說，你們好像學校學生在演戲。」

蔣公總統很重視聯戰班訓練的，不久全國黨政軍最高首長，全由聯戰班第一期同學擔任。他們是行政院長孫運璿（受訓時是臺電總經理），中央黨部書記長張寶樹（受訓時是立法委員），國防部參謀總長、後任國防部長宋長志（受訓時是總統侍從室侍從官）。民國七十七年端午節前寫於洛杉磯蒙市寶島花園。